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编



# 古代历史人物 论评



**古代历史人物论评**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8.575印张 211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70

书号：11173·136 定价：1.75元

## 目 录

- 研究中国古史必须继承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金景芳 (1)
- 诸葛亮事迹简述 ..... 宋九才 (22)
- 略论杜预 ..... 林校生 (35)
- 评北魏重臣高允 ..... 朱舒甲 (53)
- 论唐太宗的新门阀观 ..... 赵克尧 (60)
- 论李昪 ..... 郑学檬 (84)
- 论赵普
- 评王夫之论赵普 ..... 李纯德 (105)
- 论陈亮 ..... 陈克明 (119)
- 耶律楚材传略 ..... [日]岩村忍著 王慎荣编译 (143)
- 剖析航海家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
- 兼评郑氏奉佛崇道说 ..... 林松 (163)
- 高拱及其回忆录《病榻遗言》
- 与黄仁宇博士商榷 ..... 蒋星煜 (190)
- 略论黄宗羲的政治思想 ..... 顾宝田 陈福林 (201)
- 《尚氏宗谱》与尚可喜研究 ..... 孙文良 李治亭 (219)
- 姚启圣建“修来馆”考 ..... 杨彦杰 (241)
- 乾隆削冗评议 ..... 夏家骏 (257)
- 附 华佗与“麻沸散” ..... 赵亚山 (276)
- 加篇 李纲籍贯考 ..... 华定漠 (278)

# 研究中国古史必须继承孔子 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金 景 芳

孔子是中国两千多年以前的人物。“五四”以前，长期被称为“圣人”，受人崇拜。“五四”以后，却截然相反，打倒孔子、批判孔子的声音，响彻全中国。同是一个孔子，为什么前后的看法如此悬绝呢？我曾研究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认为“五四”以前，崇拜孔子是有道理的；“五四”以后，打倒孔子、批判孔子，也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从政治上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五四”以前，中国社会是封建、半封建的社会，孔子思想能为这个社会的政治服务；“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中国社会正在或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即正在或已经被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这时，孔子思想不但不能为这个社会的政治服务，反而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必须清除。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指出“尊孔读经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而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则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两段话是不是矛盾呢？我看一点儿矛盾也没有。实际上，毛泽东同志说尊孔读经应该打倒，是从政治方面观察问题，目的在于反封建；说应当继承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是从学术方面观察问题，目的在重视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政治与学术不能说没有联系，但毕竟是两回事。

过去长时期都在搞革命，人们对待孔子大都强调政治方面，

这无疑是对的。今天我们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重视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就应当把从学术方面看待孔子提到日程上来。

我是研究中国古史的。在长期的工作中，深深感到孔子这一份遗产的珍贵。下面准备着重从两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

## 一、什么是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个问题，当前学术界在看法上还有分歧，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题在这里谈谈。

孔子是儒家之祖。儒之得名，在于“以道得民”<sup>①</sup>，即“有六艺以教民者”<sup>②</sup>。因此，司马谈说，“儒者以六艺为法”<sup>③</sup>，司马迁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sup>④</sup>。我看这是对儒家和孔子本人的最正确的了解。今人言孔子而否定孔子与六艺的关系，显然是不对的。

应当指出，孔子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不能理解为《周礼》所说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①《周礼·天官·大宰》。

②《周礼·天官·大宰》郑注。

③《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史记》这段记述基本上可信。就是说在孔子时，由于社会动乱，已经是礼乐废，诗书缺。赖有孔子掇拾整理，得广流传。至《易》和《春秋》，虽无缺失，而《易》为卜筮之书，《春秋》亦是邸抄一类，价值不大。只有经过孔子探赜索隐，极深研几，著成《易传》和《春秋》，而后《易》和《春秋》遂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高深的两部理论书。

《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於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说明孔子对于《诗》《书》的功绩，只在于论次。论是去取。次是编排，论次之外，即没有孔子的东西。孔子对于《礼》《乐》的功绩，则在修起。修起只是免于澌灭，也与著作不同。孔子对《易》和《春秋》则不然。孔子成《春秋》固然是

作，孔子对《易》，有《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传于世，也应该说是作。《周易》一书本来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政治的和哲学的思想。不过，这个思想长期郁而不彰。今观《左传》《国语》诸书所载，春秋时人说《易》，依然为巫史旧业，了无新意。自孔子出，而烛见幽隐，独喜斯书，读之韦编三绝，成《序》、《彖》、《系》、《象》、《文言》、《说卦》等十篇，而后《周易》奥义始大明于世。

《汉书·儒林传》述此，说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同书《艺文志》也说：“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是孔子为《易》作传，信而有征。

王充《论衡·正说》说：“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既云《逸易》，显然不在《易传》十篇之内。乃《隋书·经籍志》说“乃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把《论衡》的“逸易”说成是《说卦》，把原来的“一篇”说成是“三篇”，既说“独存”，又说“唯失”。似此矛盾百出，何足为据？然而，后世学者如皮锡瑞竟然以此为据，说“所谓‘三篇’盖兼《序卦》《杂卦》在内。据王充说《说卦》至宣帝时始出，非史公所得见。故疑《世家》‘说卦’二字为后人擅入者。误信《隋书》错乱疑似之谰言，来否定《史记》灼然可据之信史，这是什么逻辑？不独皮锡瑞有此说，前人也有说《序卦》《杂卦》非圣人之言，《说卦》《序卦》《杂卦》词指不类孔子之言的。<sup>①</sup>我初读《易》时，亦曾误信此说，读之既久，始知此说实大谬。试辨析之。

《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以乾坤二卦居首，这不是偶然

①《易经通论》。

的，而是有深意存焉。《易·系辞传上》说：“子曰‘……乾坤其《易》之蕴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又《易·系辞传下》说：“子曰：‘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这两段话是什么意思呢？用《易纬·乾凿度》的话来说，就是“乾坤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乾坤在此象天地，其余诸卦象万物。《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正是说明这个问题。《系辞传上》说：“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也是说明这个问题。所谓“乾坤其《易》之蕴耶？”就是说乾坤二卦蕴藏着《易》的全部内容，其余诸卦不过是乾坤二卦的展开和发展。“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正是从《易》是乾坤二卦的展开和发展这一点谈问题的。所谓“乾坤其《易》之门耶”，这个“门”，同“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的说法是一致的，也是说其余诸卦都是乾坤二卦这个门的一阖一辟的结果。“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正是说这个《易》之门的一阖一辟所产生的情况。同时也说明《易》具有“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sup>①</sup>的性质。这一思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也就是，“乾坤之策当期之日，二篇之策当万物之数”。说“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实际上是就既济、未济二卦来说的。因为六十四卦至此已完成全部发展过程，亦即作为《易》之蕴，《易》之门的乾

<sup>①</sup>《易·系辞上》。

坤二卦，至此已发展到尽端。六十四卦从乾坤到既济、未济，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个发展过程的链条。这个链条发展到既济、未济，从表面上看是止息了，然而并没有止息，也不可能止息。《序卦》说“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正是说明这个问题。

《周易》六十四卦的结构本来是有哲学思想的。孔子为《周易》作传，只是发现了这个哲学思想，并给予全面地深入地阐释，并不是无中生有，硬把自己的思想加进去的。所以，今日有人割裂《易传》与《周易》的关系，说《易传》有哲学思想，《周易》没有哲学思想，或者说《易传》不出于孔子，是汉人所作，都是不对的。

如上所述，孔子作《易传》，从《序卦》《系辞传》和筮法等许多方面来阐释《周易》六十四卦结构所固有的哲学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思想里边包括有辩证法的对立的统一的思想、质量互变的思想。这个哲学思想，毫无疑义已达到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后世不断有人疑《说卦》三篇后出；疑《序卦》《杂卦》三篇词指不类孔子之言；这正如庄子所说：“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惟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只有今天，我们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为孔子所阐释的《周易》哲学思想，才是可以了解的。

《周易》六十四卦的结构实际上象征着一个大的事物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是以乾坤二卦为首，以既济未济二卦居末，中间则是发展中的若干环节，称“乾坤”，称“阴阳”，称“天地”，本质上是一个东西，都是对立的统一。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或者说“乾坤其《易》之蕴云云”“乾坤其《易》之门云云”以及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sup>①</sup>“至哉坤元，万物

<sup>①</sup>《易·乾卦象传》。

资生”<sup>①</sup>“乾坤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sup>②</sup>等等，都不是别的，都是说明由乾坤这个对立的统一发展为众多的环节，以至最后达到既济、未济。每一卦都有六爻。由初至上，可以视为量变；由前一卦至后一卦，可以视为质变。用《易传》的语言来说，这就是“《易》穷则变，变则通”<sup>③</sup>。“穷”，是量变的穷；“变”，就是发生质变。这个变，按照《序卦》所使用的公式，就是“……必……，故受之以……。”或“……不可不……，故受之以……。”也就是说，这个变的中间有必然性，当然，这个发展过程都是出于主观臆测，没有客观依据，是不科学的。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认识到这样程度，已经是很了不起，又怎能要求他做到科学呢？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史记》关于孔子为《周易》作过《序》、《彖》、《系》、《象》、《文言》、《说卦》的论述，是可以信据的。今人谈哲学，谈辩证法，每喜称道赫拉克里特，而对于孔子则百般诋毁，这不能说别的，只能说是不学之过。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同书《司马相如传》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这是对《易》和《春秋》二书本质特点的正确的理解。《史记》说“《易》以道化”同《庄子·天下》说“《易》以道阴阳”，是一个意思，都是指《周易》存在辩证法思想来说的。“化”是从其有发展观点一方面来说的；“阴阳”，说的就是对立的统一，就是矛盾。《史记》说“《春秋》以道义”同《庄子·天下》说“《春秋》以道名分”也是一个意思。“名分”是礼上事。《左传》庄公十八年说“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①《易·坤卦彖传》。

②《易·系辞传上》。

③《易·系辞传下》。

这是“名分”二字的正确含义。“义”是指礼义而言。《太史公自序》又说“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也是这个意思。说“《春秋》推见至隐”，“见”是指史实，“隐”是指理论。史实是具体的，所以是见，理论是抽象的，所以是隐。《春秋》，是辨是非的，由显著的史实推究出隐微的理论，这就叫做“推见至隐”。《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说明《春秋》虽然是史，然而所重在义。这正是所谓推见至隐。《易》则反是。《易》是“本隐以之显”。“隐”是指《周易》作者的哲学思想来说的。思想是精神性的东西，不是感觉器官所能认识的，所以是隐。但是这个隐通过蓍卦等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就变成显了。《易》和《春秋》在六艺中，都是谈理论的。而方法不同，所谈的内容也不同。《史记》所述，实正确地指出二书的本质特点。

鲁史虽名春秋，但春秋一名并不是鲁史所专有。《国语·楚语》说：“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又《晋语》说：“悼公与司马侯升台而望。曰：‘乐夫。’曰：‘临下之乐则乐矣，德义之乐则未也。’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从上述这两条材料来看，晋楚也有春秋。晋楚春秋的特点在于“耸善而抑恶，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则孔子《春秋》的特点，正与晋楚之春秋相同。

据《孔子世家》说：孔子作《春秋》是“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这个“据鲁亲周故殷”同《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

夷狄”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春秋》是礼义之大宗的具体表现。何休不辨古字通假，误以“亲周”为“新周”，而把“据鲁亲周故殷”释为“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并把“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诸义，同“衰乱、升平，太平”混在一起，重纰缪，积千百年，无人知其非者。可见读孔子书，也并非易事。实际上，由于《春秋》为鲁史，故“据鲁”。“亲周，故殷”则是表明鲁与殷、周的关系。宋为殷后，故“故殷”亦曰“故宋”。亲故二字，正体现礼数不同。这个不同，在《春秋》书法中有着具体反映。所谓三世，内外，义亦同此。《史记》所称贬、讳之义，亦《春秋》所有。正因为这样，《春秋》非孔子不能作。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孔子的遗产，首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其中尤以《易》和《春秋》二书最为珍贵。此外，如《论语》及七十子后学遗说，亦不宜忽视，今人多承认《论语》是孔子遗产，而不承认孔子的主要遗产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这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 二、为什么说研究中国古史必须继承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学习了孔子的论述，了解到继承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对于研究中国古史异常重要。下面就分别从原始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几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来谈谈这个问题。

### 1. 原始时代

#### (1) 大同、小康。

今天保存在《礼记·礼运》里，有孔子回答言偃问的一段话。孔子的这段话全文如下：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话主要是谈礼的产生问题，意思是说，礼产生于三代，即夏商西周的英明之君，五帝时是没有这个礼的。郑玄为“大道之行也”作注说：“谓五帝时也。”这个注释是对的。“五帝时”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就是原始社会。“丘未之逮也”，郑玄说：“逮，及也，言不及见。”也是对的。“而有志焉”这个“志”，同《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说“军志有之”、成公四年说“史佚之志有之”的“志”用法一样，都是指文字记载而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下至“是谓大同”讲的是五帝时，即原始社会时的具体情况。

“天下”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天下为公”的“天下”，不但不能用我们今天所说的天下来解释，也不能用“天下为家”的天下来解释。恩格斯说：“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又说：“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

的。”<sup>①</sup>所以，“天下为公”的“天下”，范围很小，最大只不过是一个部落。康有为把它理解为“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肯定不是《礼运》的原意。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讲的是社会情况，反映这时还没有阶级。执行社会职能的氏族首长，是由选举产生。氏族集团之间互相讲求忠信和睦，没有战争。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讲的是家庭情况，反映这时的家庭是母系氏族家庭，而不是父系氏族家庭。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讲的是经济情况，反映这时的经济是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经济。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反映这时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自“今大道既隐”至“是谓小康”讲的是国家出现以后的情况。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讲的是家庭情况，反映这时的家庭是父系家长制家庭。

“货力为己”讲的是经济情况，反映这时是私有制经济。

“大人世及以为礼”至“以功为己”讲的是社会政治情况，反映这时国家已出现，阶级统治工具相当完备。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讲的是阶级斗争，反映这时不但产生了阶级，而且阶级斗争日益加剧。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选”就是“英”。郑玄注说：“‘英’是俊选之尤者。”是对的。实际上是把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人，看作是奴隶社会的代表人物，而把中国奴隶社会与原始社会的分界线划在夏初。当然，当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12页。

时还没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这样的名词概念。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至段末，极其明白地说出，礼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并在阶级社会广泛应用。孔子这一观点也见于《礼记·昏义》，原文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也见于《礼记·郊特牲》，原文说：“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这两段话是什么意思呢？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sup>①</sup>。恩格斯在说明这个问题时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sup>②</sup>孔子所谓礼义，不是别的，实际上只是阶级关系的异名，而这种关系孔子认为正是导源于个体婚制。

《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段话论述得尤为完整而系统。大意是说礼义起源于有夫妇，而完成于有君臣，有上下。这个观点可与《礼运》大同、小康的观点互相补充。由上述可以证明孔子对历史的看法，不是偶然的、凌乱的，而是有完整的体系。这个完整的体系乃是掌握了大量的史料，并经过长期地认真地进行鉴别和研究的结果。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说：“《礼运》，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吕成公谓‘蜡宾之叹，前辈疑之，以为非孔子语。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论’。朱文公谓‘程子论尧舜事业非圣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贤可为，恐亦

<sup>①②</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8页。

微有此意。但记中分裂太甚几以帝王为有二道，则有病’。”这是宋人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因而不相信五帝三王不同道，怀疑大同、小康之说非孔子语。

今人编《辞海》于“大同”条说：“儒家宣扬的理想社会。”即亦认为“大同”是理想，不是事实。殊不知存在决定意识，没有客观存在，怎会产生这样理想？

看来还是郭沫若范文澜二同志能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郭沫若同志于《奴隶制时代》一文里说：“原始公社制的存在，……这在儒家经典里面是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而被称为‘大同’之世的。”又说：“由原始公社制转变为奴隶制，这在中国是在唐、虞时代以后出现的，《礼运》所谓‘小康’之世，大抵和这相当。”范文澜同志于《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说：“照《礼记·礼运篇》所说，禹以前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公有的大同社会；禹以后是财产私有的阶级社会。……《礼运》说禹时财产公有制度转变到私有制度，这是比较可信的传说。”也就是说，郭沫若同志和范文澜同志认为孔子“大同”“小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可信的，并不认为是什么理想。

由上述的事实可以证明，我们研究中国原始社会以及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历史，必须继承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 （2）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这是孔子说的话，见于《孟子·万章上》。这句话的观点同上述“大同”“小康”的观点是一致的，都正确地反映历史事实。“禅”是民主选举，“继”是世袭继承。禅、继的不同，正反映两个历史时代的不同。

## 2. 奴隶社会

### （1）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尚施。

《礼记·表记》：说：“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

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段话明确地指出夏殷周三代社会思想的不同特点。

这里称夏道、殷人、周人，也是有分寸的。这种称呼同称夏后氏、殷人、周人一样，表明夏与殷、周还有区别。用今天的概念来说明，就是夏还处在向国家过渡的阶段，而殷周已完成了过渡，成为真正的国家。

夏道尊命，在《墨子·非命上》说：“于《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此言汤之所以非桀之执有命也。”可以得到证明。

尊命的不尊神，尊神的不尊命，证明命与神不宜并为一谈，据我看，古人之所调命，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规律，规律有必然性，但并不排除偶然性，《孟子·尽心上》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实际上，孟子所说的“正命”指的就是必然性，“非正命”指的就是偶然性。《庄子·列御寇》说：“达大命者随，达小命者遭。”“随”命指的就是必然性，“遭”命指的就是偶然性。可见古人对于这一点，也并不是完全不了解的。

殷人尊神，率民从事神，这一点，从殷墟甲骨卜辞中可以找到证明的材料很多，就不在这里详谈了。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尚施”就是“务施报”<sup>①</sup>。《礼记·郊特性》说“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可为证明。

“尊礼”的礼是什么呢？《说文·示部》说：“礼，履也。”译成今天的语言，礼就是行为的规范，但是周代的礼与夏、殷二代的礼不同，又有它自己的特点。周礼的本质特点在于它是以亲

<sup>①</sup>《礼记·曲礼上》。